



臺大學術資產～

南島語族研究

南島語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系，涵蓋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嶼地區的大部分語言，包括臺灣原住民在內。而臺灣南島語因保留較多祖語，歧異度高，而被語言學家視為南島語族最可能的原鄉；黃宜範教授從語言學證據加以佐證。此外，鄭恆雄教授鑽研布農族語逾40年，發現布農族語的動詞變化、時式與時態最為複雜，也佐證了臺灣南島語在南島語典型特徵的「焦點結構」，保存得最為完整。語言反映人類的認知系統，臺灣南島語的焦點不以「人」為唯一中心，還有其他生物、自然與空間，這在人類語言當中極其獨特，也再次凸顯臺灣南島語的重要性。

臺大自臺北帝大成立「土俗人種學講座」以來，對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之研究未嘗中斷，近年來基於東南亞是地球上族群分布、語言及文化薈萃的區域，人類學系也將田野地擴展至東南亞。不同於語言學抽絲剝繭式的考證，謝世忠教授期望透過跨文化比較研究，為人類族群文化搭建起對話的橋樑。從對遇、刺激、啟迪當中，承受多元文化衝擊的歷練，進而能包容異己，乃至由衷感動。此即人類學的信念。



原住民與南島／東南亞與島嶼 —人類學長遠橋樑的搭建

文・照片提供／謝世忠

臺大校園國內外貴賓訪客不斷，正式拜會之餘，人類學系的博物館（正式名稱為「民族學標本陳列室」與「考古學標本陳列室」），常是校院主管推薦前來參觀的地點。人類學系照顧兩個陳列室，除了提供外賓欣賞之外，其典藏展示內容當然也是系上教師學生研究的範圍。不過，60年來（按，人類學系創立於1949年）參訪者雖始終不斷，然對標本的研究，卻曾有過長期間斷，此一現象述說著人類學系研究取向的變遷歷史。

人類學傳統上較著重於原住族群、少數人群、及邊陲或角落社群等的生活文化研究。臺大人類學系成立之後，自然追隨此一學術特性建置學問。南島系臺灣原住民在臺北帝國大學時期，即是日籍民

族學者的調查研究對象，人類學系承接傳統，繼續山地、東海岸、或外島田野。兩個標本室所藏標本，尤其是民族學方面，多為日籍學者和戰後20年間的收集。今天，臺大被公認為原住民傳統文物最豐富的集中之地。典藏如此，人類學系師生目光亦快速聚焦。第一波「標本人類學」或「博物館民族誌」盛況就在1950至1970年代。

自2000年開始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是人類學系標本研究第二波高峰。配合數位計畫的推動，多位教師動員大批助理學生團隊，對文物進行逐項電腦資料庫建檔與記錄資訊再研究的工作，目前任務大致已近完成。不過，該計畫畢竟是以多層次維護文化資產為主要目的，因此急於整理基本材



謝世忠小檔案

現任臺大人類學系教授。1977年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，1982年取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，1989年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。此外，在留學美國期間曾專修泰國語文，因此也擁有一泰文化研究學士學位。

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北東南亞民族誌、泰／寮國族關係、臺灣原住民當代現象、民族史方法、第四世界理論、詮釋人類學、觀光人類學、發展人類學及族群理論等。主要著作有1987年《認同的污名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》、1990年《人類學研究－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》（與孫寶鋼合編）、1993年《傣泐－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》、1994年《山胞觀光－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》、2002年《臺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－賽夏族》、2004年《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－臺灣原住民論集》、2004年《國族論述：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》、2004年《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－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》（與張維安合著）、2007年《移民、返鄉與傳統祭典－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參與及文化認同》（與劉瑞超合著）、2007年《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、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第二期委託研究－泰雅族、太魯閣族》（與郭倩婷、楊鈴慧、劉瑞超、李韋誠合著）、2008年《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、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第五期委託研究－布農族、邵族》（與楊鈴慧、劉瑞超、李韋誠、黃昱中合著）與2009年《原住民女性的律法脈絡－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》（出版中）（與劉瑞超、楊鈴慧合著）等，另有學術論文和一般散文約計200餘篇，為一位研究領域多元且著作產量豐碩的人類學者。

料列入首要，而典型的學術學理再生產一事，就相對有限。所以，形式上雖有兩波標本研究熱潮，但事實上第一波才是真正「為研究而研究」的動機促成。

第一波盛況之後，眾人突然紛紛遠離博物館標本，主要是人類學強調社群地方的現場參與，促使師生必須「出田野」，而蹲坐標本室內的靜物景況分析，就不再受歡迎。人類學系師生即使繼續原住民社會文化研究，但民族學標本陳列室卻變成人類學系系館人來人往所忘的「孤星」，它和考古學陳列室一起就真的成了接待外賓唯一功能。

不過，嚴格來說，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秉持日人所留下之原住民研究傳統雖是一項事實，但1955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之後，原住民研究重心有轉移至此之勢。人類學系自1970年代以降所新聘之教師，其博士論文主題均無關原住民，直

到2001年方見相關專長新秀加入行列。情勢影響所及，人類學過去30年所開課程直接以「臺灣土著」、「臺灣南島語族」或「臺灣原住民」為名者，基本上相當有限。學生倘若未選到課程，人類學系畢業仍陌生於原住民，並不為奇。

筆者1989年獲聘為人類學系教師，如前所述，自己正是非原住民博士論文研究而進入系上任教者之一。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求學時（1983-1989），教授群期望訓練筆者成為東南亞人類學專家，所以就從學習泰文開始，一直到在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完成傣族研究博士論文為止，本身已累積了相當的東南亞社會文化專業知識。回到臺灣，一方面自覺該至少貢獻本土研究10年；另一方面，又因1984、85年曾以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族群現象進行碩士論文研究，所以決定延續興趣，結緣原住民。於是，來校任教始起，即讓自己慢慢成為原住民議題的「專家」。

只是筆者的「專家」屬性，與典型專注於特定一族一聚落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模式不同。筆者認識千百個原住民，他們或多或少都與八〇年代以降的社會運動有關，各族都有，部落原鄉與都市新鄉各半。臺灣有不少從事某一族研究的人類學專家，類似「某某人是研究泰雅族的」話語，成為普通應答常識。在此一前提下，即使不少原住民朋友認定筆者係少數瞭解他們的學者之一，筆者始終就不是某一族專家。

作為一名非專家的專家，著實稍感尷尬。就在部分研究同仁設法專精於某族之同時，筆者自社會運動拓展而出的族群理論、觀光人類學、第四世界論述，以及文化展演等議題，可謂為原住民研究的「異數」，若再合起一群弟子學生，大概就可稱為「異軍」吧！異軍不一定突起，但至少為臺灣人類



2001年啟動另一個10年計畫－探討同一族系人群遷移與面對不同國族—國家的文化族群主導性展現機制。圖為在臺灣清境農場（2002）的田野。

學的原住民研究，灑下多元種子。

時間匆匆，原訂貢獻家鄉議題10年，如今卻已滿了20（即1989至2009）。10年之時（即1999）曾思「中止」原住民研究，轉而回至華盛頓大學教授們當初期望的東南亞人類學專家本份。但是如切豆腐般地每十年一個範疇的規劃，真是天真，根本行不通。原住民早已不是只有被研究。多年來筆者知心朋友兩大群，一為三、五位學界同仁外加助理學生們；其二就是原住民老中青少男生女生。回望自己的研究史，頓然發覺原來標準的田野筆記、錄音、訪談、攝影等等程序，幾乎早已全被忘了。道理很簡單——「你和朋友相處把歡會記錄謄寫嗎？」

這麼多年下來，沒有錄音，沒有訪談，沒有筆記，但卻與無數原住民有著悲苦歡樂經驗的分享。揣此，竟也理出了原住民社會運動25年來的五大型態：族群政治運動、藝術文化運動、躍進學術運動、文學建構運動，以及族稱獨立運動。這五大運動並無絕對的演化關係，它們或有前後時間落差，但也相當程度地並置存在，當然，力量或聲勢消長亦所難免。

話說原住民的學術關懷雖不能中斷，然東南亞研究卻也已悄悄排進筆者的研究進程。自2001年起，開始密集走訪寮國（主要在極北近中國之處）、臺灣（主要在南投清境與中壢龍崗）、北美的Tai-Lue人（即博士論文所研究之中國所稱的傣族）社區，啟動另一個10年計畫，探討同一族系人群遷移與面對不同國族—國家的文化族群主導性展現機制。換句話說，筆者回到了東南亞「老本行」。事實上，雖說是「老本行」，但應是「新本行」，畢竟「老本行」位置早已為原住民研究所取代。

在人類學系，自1990年起迄今，計開授過「大



從老本行到新本行，自2001年起即意欲推動東南亞研究。圖為與臺灣原住民朋友合影（2007）。

陸東南亞部落與文明傳統」（1990）、「大陸東南亞人類學專題」（1994）、「北東南亞與西南中國跨境研究」（2000）、「大陸東南亞民族誌專題討論」（2002）、「東南亞南傳佛教社會專題」（2005），及「東南亞族群遷動專題討論」（2009）等6門關及東南亞人類學之課程，意欲推動臺灣東南亞研究之企圖心甚強。然而，系內系外、校內校外始終靜悄悄，回應者稀疏寥少。九〇年代中葉，突然國內起了東南亞熱，從中央研究院到幾所大學，紛設研究單位。但這些均和人類學系這幾門課的鼓吹無關，反而它們均是呼應政府南向政策的學界反應。10年下來，幾個以「東南亞」為名之當初熱潮單位，卻又紛紛去掉「東南亞」，轉而歸入「亞太」（如中央研究院）或「亞洲」（如淡江大學）之更大架構下。但臺大的東南亞人類學課程仍舊開授，為學問而學問，在熱潮之外耕一份耘田。

就在國內東南亞機構建置熱潮驟減之際，人類學系內卻反而熱度升高。最近三、五年，部分教師



在臺灣從事田野工作數十年，結識千百位原住民朋友，不做錄音，沒有筆記本，有的是同悲同喜的交情。圖為在寮國進行田野調查（2006）。

與研究生突然跨出臺灣，開始從事境外田野研究。他們選擇的地點，就是東南亞。不過，師生們的田野地並非筆者前述幾門課程的「大陸」範圍，而是西太平洋上的「島嶼」區域。換句話說，筆者的幾門授課，絕不是今天系內師生興趣於東南亞的貢獻者，因為「大陸」、「島嶼」兩區基本上形同絕緣，其中最大區隔要素即是前者「非南島」，後者「純南島」。

李嗣涇校長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項下，於2007、2008年主動推展的南島研究兩年實驗計畫，或許正是推手。臺灣原住民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已超過百年，但對於「原住民研究即代表南島研究（Austronesian Studies）」的概念，卻始終模糊。亦即，一個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研究者，往往不會提及自己正在進行「南島研究」。傳統上，臺灣的人類學屬性非常在地化，百位現職之學院專業工作者，僅有個位數字成員有境外田野經驗。大致上，「山地文化研

究」、「土著文化研究」、「原住民文化研究」等，就是學者們思考的最高範疇。約近10年之前，有人為臺灣原住民創出「南島民族」一詞。他們不知何由，不喜用「原住民」，但「南島民族」又甚為奇怪，它一來並非當事人自我認同的族稱用詞；二來以原為語言學南島「語族」術語自動地轉為「民族」，根本未有學理上的合宜基礎（亦即，什麼是「民族」，基本上並未經過討論釐清）；再者，國際南島對臺灣而言，事實上極其陌生，幾乎少有對話，如今在本土性濃厚之原住民研究背景上，突兀地冠上具高度國際意涵的「南島」民族，到底用意為何，不得而知。

不過，臺大南島計畫總算喚起了注意國際南島的意識。幾位師生開始摸索於馬來西亞東西兩邊，以及印尼峇里島幾個地點。南島計畫兩年過了，未聞校方有延續的規劃，但研究人員畢竟已跨出了一步，大家似仍未放棄努力。基本上，它像是南島系臺灣原住民研究之後的國際南島拓展。臺大的南島與包括東馬與峇里島在內的島嶼東南亞熱潮，是否有天會如前述國內東南亞機構建置熱潮一般的衰退，仍待觀察，但依國人行事一段不接一段，一個有限年月計畫結束，就完全拔根的習慣（臺大南島計畫兩年結束，船過水無痕，即是一例），實令人難以太過樂觀。不過，人類學系的東南亞課程仍會繼續，歡迎有緣人來唸書、來紙上田野異國。

筆者在南島計畫之初，即預見了此一未來可能的發展挫折。因此，當時主張不要僅限於南島，而應拓展至環東亞的非南島之島嶼地區如庫頁島、千島群島、北海道、琉球群島、南海島群等，進而思考建置一「島嶼人類學」方法理論的可能性。筆者強調的不是四處有人（包括中研院和幾所教研機構）在做的南島遺傳、語言文化等之類緣關係，而



是主張應關注島嶼適應與主體世界觀類型的民族誌比較研究。當然，同仁們不一定瞭解其意，即使瞭解也不一定有配合的必要。於是，有的仍繼續在類緣概念下從事研究，有的依舊堅持臺灣本土，而筆者則提出了「北海道愛努人與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的比較」之研究課題。兩年下來，田野資料甚豐，因此早已超越須有南島計畫支持之思維，今天僅剩個人單飛，還是積極進行研究。

筆者每年至少前往寮國和北海道各三次，不在現場之時，也有安置在地助理協助收集資料。這兩處需要錄音和筆記的田野，加上早就忘錄音與筆記的原住民情誼交往，使自己時時在文化高度異質性的情境，交錯呈現，時空往往剎那轉變，飽滿地承受了多元文化衝擊的歷練。

今天，仍有年輕學者學生正致力於自己是原住民某族專家的事業之中，而筆者卻離此越來越遠。自己同時擁有好多族，也讓

好多族同時擁有我。筆者承認自己的學術著作都不會太「深奧」，簡單平易是為風格。不專注一族數十年，他人當然認為你寫不出深奧文字，但自己至少忠於堅持的人類學信念。筆者以為，太過解剖一個人身肉體組成的族裔群體，分析到細緻點滴，實是一難以承受的壓力，對自己如此，對被研究者亦然。淡淡的陳述，有時反而效果驚人，準確地打動心底深處，而這份心情往往是自我冷靜執著的文化解剖手，所難以體會者。

最後，再回到前文提及的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。數位典藏之際，我們的思維仍是臺灣原住民，而非莫明其義的「南島民族」。一族一族的檢視查證資料，排比照片、影片、文字，慢慢地對原住民與過去研究者，有了多一份的認識，本土學術知識亦藉此精進。我們應會在此一資料寶庫中繼續學習文化，研究學理，也將在作為南島東南亞，以及作為島嶼特定生態文化區之一份子的基石上，開展超越類緣關係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工作。大陸東南亞泰寮族裔不是南島也非島嶼，北海道愛努人居屬島嶼但非南島，這些都是比觀共享的資產，尤其在為原住民朋友，或Tai-Lue與愛努族人講述對方故事之時，其間的文化相對刺激啟迪，令人驚嘆感動。

人類學家的實踐此為一例。人類族群文化不就是要對話嗎？縱橫於臺灣、南島、東南亞、非南島、北海道、島嶼之間，筆者的人類學橋樑搭得長遠。（本文撰寫期間，承筆者專任研究助理郭欣諭小姐費心協助，特此誌謝。）（本專題策畫／外文系江文瑜教授）



積極建置島嶼人類學方法理論之可能，近兩年進行北海道愛努人與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之比較研究。圖為2008年於北海道田野。